



一千两金



新 加 坡 华 裔 富 商 的 传 奇 人 生

任九皋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任九皋 著

一千两金



新加坡华裔富商的传奇人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千两金——新加坡华裔富商的传奇人生/任九皋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14-04561-4

I. 一... II. 任... III. 任九皋—回忆录 IV. K833.39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4347 号

书 名 一千两金——新加坡华裔富商的传奇人生
著 者 任九皋
编 译 周兆呈
校 译 陆昭岩
责任编辑 周晓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8.25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561-4
定 价 50.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题 献

谨将此书献给商界早期先辈们，尤其是桑迪·法克斯(Sandy Farkas)与弗朗辛·法克斯(Francine Farkas)夫妇、路易斯·鲍威尔(Louis Powell)、海·卡茨(Hy Katz)和欧文·阿尔伯特(Irving Alpert)，以及所有为亚洲经济奠定基础的公司和客户，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成就了后来的经济奇迹。

中文版谢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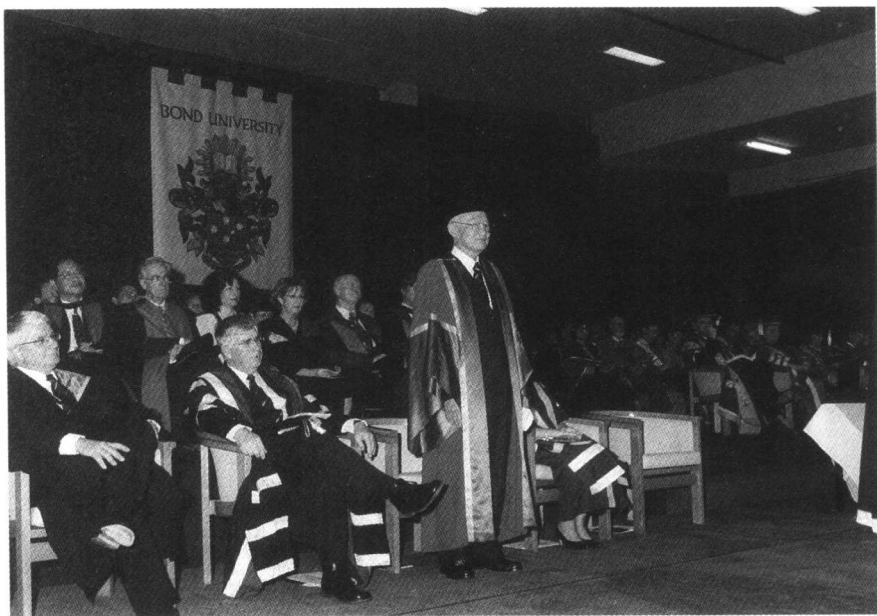
当周兆呈先生把我写的英文自传《一千两金》用中文编译完稿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本经过两年半时间陆陆续续信笔而写的自传，在结构重新编排之后，除了语言用词更为清晰条理、优美生动之外，还充分显示出中文背景的脉络和渊源，实在让我惊喜不已。

我有幸与周先生相识，他非常年轻，年纪和我相差近半个世纪。当时我对他知之不深，只知道他在新加坡第一大华文报《联合早报》工作，直到几个月以后，在香港《亚洲周刊》上看到文章特别推荐他的新著《两岸三地 点到为止》，再拜读他的书，看了林任君先生特别为他写的序文，我方才知，周先生是一位如此年轻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而且还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修博士学位。在工作和学业的忙碌日程中，还要为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详细地做编译工作，真是我的幸运，也不禁令我抱有很大的歉意。

周先生是非常杰出的年轻人，而新加坡任人唯贤、提拔年轻优秀人才，此种情形在政商学界到处可见。这种做法，实在值得很多大国小国予以借镜。

这也让我想到，在我去国 40 多年后，于 1990 年代回去与当年中学和大学同学重逢欢聚之时，也感觉到他们在各方面，尤其是语文方面的进步，令我吃惊。当年在学校里语文并不出色的同学，都能写出很好的文字。而数十年来，不论当年在学校里成绩好坏，大家都在几十年中为国家做了很多的事，可见人才处处，端有赖培养、锻炼以及学习成风，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由此坚信，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仔细阅改中文版的自传，让我再次穿越时空，细细



2003年6月,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

体会自己数十年来的生活与工作。当我一字一笔地记录下悲欢离合的人间情、故国景、商场事，常常深自感慨。我始终坚信，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情字。同时，我的故事或许因为时代风云、国家剧变而点染沧桑之色，那么这也正是我期待的，可以让我的同时代人和后来者从书中看到和了解些什么。

我的英文版自传是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撰写的。很幸运，我经商生涯中最早的两位老板，现年 92 岁的埃菲姆·克洛克(Efim Krouk)先生，以及百岁高龄的弗兰克·斯塔基(Frank Stuckey)先生均还健在，退休后居住在澳大利亚。

克洛克先生是我的第一位老板，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帮助我迈过了从律师行业进入商界这道门槛。从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小律师，到后来加入石利洛洋行，13 年中，他一直在指引我，是我的导师和保护人。

弗兰克·斯塔基先生和我共事了两年，他将我带到台北，开始了我在台湾的工作生涯，为我此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在这样一位友善而通情达理的老板手下工作，我也更加自信。

以上两位都曾阅读过我的书稿，并对有关我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石利洛洋行工作时的章节做了更正或补充。他们使我的故事更加完整，增加了一些此前我并不知晓的事情。

此后，我又请和我共过事的朋友们阅读初稿的全部或部分章节。他们也帮助我更正了书中的错误，补充了一些我遗忘的事件。其中有几位更是不惜花费时间，将草稿通读一遍。

罗杰·艾克斯泰尔(Roger Axtell)先生常说，虽然我现在在出口贸易领域很活跃，与全球许多著名人物和商界领袖打交道，但我的起步是在派克公司。在罗杰负责派克钢笔公司全球出口业务的大约 15 年时间里，我们一起共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我打电话给美国最成功的邮购公司，布莱恩特(Brylane)公司董事长彼得·坎佐(Peter Canzone)先生时，我问他是否可以阅读一些章节。书中有些部分是关于他这一行业以及他的前任老板莱斯·威克斯纳(Les Wexner)

的,还有一些章节涉及到七八十年代美国贸易环境和思想理念的变化。彼得说,“把书稿寄给我,我要全读一遍,然后告诉你我的想法。”

彼得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生意,他的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零销商之一、法国碧诺春天雷都(Pinault Printemps Redoute)公司的一部分。尽管非常繁忙,他仍答应我在飞机上把我的全部书稿读一遍。

傅俊明(Patrick Fu)、比尔·韦德本(Bill Whitburn)和史蒂文·曾(Steve Tseng)是我以前三位非常能干的同事,他们现在把我以前的公司林麦管理得井井有条,收入和利润比我 1993 年离开时翻了一番。他们都答应把我的书稿读一遍。我的很多商业活动他们都是参与者,因此可以帮助我确认书中涉及到的人名和地名是否准确。

我还要感谢那些帮助我校对书中与之有关章节的人,他们大多是各自所在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是:

梅尔·霍普特(Mel Haupt)先生,梅尔维尔针织品公司(Melville Knitwear)创始人,担任董事长 30 多年,现已退休,居住在纽约。

鲍勃·利文斯顿(Bob Livingstone)先生,联合纺织品公司(Associated Dry Goods)前副总裁,现退休,居住在佛罗里达。

杰克·林德纳(Jack Lindner)先生,J.W.梅氏公司(J.W.Mays)前副总裁。杰克现已 94 岁高龄,我寄给他的书稿他没有做任何改动,对我写的内容完全赞同。

西德·杜利特尔(Sid Doolittle)先生,在蒙哥马利·沃德公司(Montgomery Ward)鼎盛时期曾担任负责海外采购的副总裁。从蒙哥马利·沃德公司退休后成为芝加哥最著名的零销业顾问之一,曾数次接受过 CNN 的采访。

此外,还有梅尔·亨得森(Mel Henderson)先生,1999 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阅读了与蒙哥马利·沃德、布莱恩特以及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有关的章节。他在这三家公司工作期间,曾与我们密切合作过多年。

哈德逊湾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加里·卢卡森(Gary Lukassen)先生,以及其

他两位副总裁罗纳德·休斯 (Ronald Hughes) 先生和罗布·诺里斯 (Rob Norris) 先生,都阅读了与哈德逊湾公司有关的章节。

我还必须感谢卡皮·罗斯曼 (Cappy Rothman) 医生以及我的朋友比尔·汉德尔 (Bill Handel),他们阅读并校对了与我的两个孩子降生有关的章节。

寺内善也 (Yoshiya Terauchi) 先生和铃木武弘 (Takehiro Suzuki) 先生对我在日本工作、生活的章节进行了详细校对,包括拼写及人名正确与否。

桑迪·法克斯先生去世时,我和法克斯的夫人弗朗辛重新取得了联系。她让我把全部书稿都寄给她,以帮助我纠正某些错误,并增加一些内容。

英文和中文版两本自传的终于完成,让我如释重负,在此深致谢意。



2001年5月,我的英文版自传《一千两金》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发布仪式。

前言

1993年5月,我决定退休时,曾给很多朋友打电话通知他们。但是,我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派克钢笔公司的罗杰·艾克斯泰尔先生的。1986年,派克被出售后,罗杰先生从公司退休,但是,当他还是派克公司负责海外销售的副总裁时,他就已经写了好几本有关他在全球各地推销派克钢笔的书。他写这些书,既是为了宣传公司,同时也是为了告诉美国的读者和商人,在国外推销与在美国做生意并不相同。那里人的言谈举止以及思维方式不仅与美国人不同,彼此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

罗杰退休后仍坚持写作,我给他打电话时,已经是第五本了。他建议我,要使退休生活更有意义,不妨也写一本有关我的经商经历的书。我知道这个想法很好,但并没有把他的建议当真,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成为一个作家。

退休几个月后,我9岁的儿子温斯顿(Winston)发现我不再去办公室,而是待在家里午睡,于是他对我说,“爸爸,我想你被你的公司解雇了。你是不是失业了?你不再工作了,你在午睡!”

我告诉他,“不是的,亲爱的,爸爸把公司卖给乔治(George)叔叔的公司了。乔治叔叔决定同意爸爸退休。其他经理可以把公司管理好,所以爸爸可以休息了。”

“或许乔治叔叔解雇你,是因为你没有像其他经理一样努力工作。”

我的温斯顿无法相信我可以并且应该退休,他接着问,“你是不是很懒?”

妻子履昇和我讨论我与温斯顿的谈话,她告诉我,她也曾有同样的经历。

当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后，她的父亲友安将军赋闲定居在香港，无所事事，每天只能与那些同时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的人来往，讨论他们的过去，对未来悲观失望。有时他也写写诗，或者写一些记述他过去的短文，并经常发表在香港的中文报纸上。

履昇有 12 个同父同母兄弟姐妹，此外还有将军其他两位妻子生的 6 个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在她的父亲刚刚退休定居在香港时，她的一个弟弟常常向哥哥姐姐抱怨，“你们经常告诉我，父亲在中国是个大人物，我不相信，我从来没有见他工作，一天也没有！”

履昇告诉我，其他哥哥姐姐会马上捂住这个弟弟的嘴，不让他说这样对父亲不敬的话。履昇对我说，“但这可能就是孩子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孩子太小，不能理解退休。他们进入我们的生活太晚，知道得太少。”

于是我们决定重新开始工作，甚至明知有些投资无利可图也在所不惜。我们约定，必须让自己忙碌起来，以免像温斯顿说的那样，被人看成是一个“懒人”。

我们的退休生活仅仅维持了一年多一点就结束了，我们又重新开始工作。但是，我们还在考虑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我也许应该写一本“书”，或许是家族的故事，让孩子们阅读，以便未来某一天他们能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从哪里来的，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是如何经历那么多的变化，如何度过那么多的战乱，不只是在中国，还有世界许多地方。否则，我们很难将我们在困难时期领悟到的经验教训，以及我们在不同领域的工作经验传授给他们。他们长大后，将无法理解我们工作是多么辛苦。除此之外，45 年的工作生活到我们第一次退休是一段漫长的历程，而故事也将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不过，我并没有真正写作，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写。后来，1997 年初的一天，我和 12 岁的女儿米拉（Myra）乘飞机从澳大利亚到新加坡。这是一次漫长的飞行，我的女儿在看电影，而我则无事可做。她当时是圣艾登女子小学 6 年级学生，英语很好。我突然想到或许我可以写点关于自己的东西，看她是否可以帮助我纠正英语。就这样，我开始写这本书的第一章。

写完后，米拉对我的英语进行了纠正，她做得很好，不到 10 分钟就改完了，而我写这些东西却花费了几个小时。但是，这却鼓励了我继续写下去，看自己还能写出哪些东西。

回到布里斯班后，我又写了一章，我的儿子温斯顿当时 13 岁，他用了不到 10 分钟就读完了，然后也做了一些修改。在让他阅读、修改第二章之前，我把我在飞机上写的、经过米拉修改的那一章给他看，然后问他，“有意思吗？”

温斯顿说，“很有意思！”

我的女儿给了我第一次鼓励，现在我的儿子又给了我第二次鼓励，我决定继续写下去。

此后，我不断把我写的东西送到温斯顿和米拉的寄宿学校，让他们修改，前后共送去了大约 12 章。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更认真一点，于是我的秘书阿曼达成为了我的第一位编辑，开始从第一章审阅我的手稿。

我开始增加写作次数，但大多是在长途飞行中，待在座位上无事可做时。后来，诺拉·克洛克夫人，我从商生涯中第一位老板的漂亮妻子，劝我真正写一本书，为此，我应该请一位专业作家和编辑审阅我的手稿并帮助我。

刚开始，我们进展很缓慢，没人知道我能否坚持下来写完这本书，有人甚至开始猜测我可能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

在我长大成人、步入社会之前，曾经历过无数坎坷，开始工作后，更是饱经战乱。由于经历了这么多的战乱年代，我写的故事越来越长。我的初衷只是写一些从年轻时代起的家族事件，但很快就涉及到了中国的政治。当写到我的工作经历时，我的故事又包括了很多朋友和熟人的轶事趣闻。之后还有很多我打过交道的公司，其中有十几家都是全球最大的企业之一。照此下去，我将永远停不了笔，我的书也永远不会有结尾，尤其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飞机上写作，每三四个星期才能写完一章，有时甚至一连几个月没写一个字。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99 年 8 月，即我在飞机上开始写第一章大约两年多时间以后，这时我已经写了大约 60 章，按这种速度，再过一年多时间，我就可以完成初稿。

当时,我正在香港访问,一次,与我以前的同事,现在的林麦公司执行董事傅俊明先生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我的写作,以及我在上海的岁月。我于1951年9月离开上海,此后48年再也没有回去过。但现在,在1999年8月的这一天,他建议我应该回上海看一看,他说,“史蒂文·曾现在是林麦中国公司的总经理,他会照顾你好。”

林麦是我于1964年在台湾创办的公司,在我退休前五六年已经在中国大陆设立办事处,但我从未去过那里。最初派去担任经理的是西方人,后来,我们聘请了一位曾经在哈德逊湾中国公司工作过的中国女士。此后,随着大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大陆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林麦在台湾和上海的公司都得到了扩大,傅俊明挑选了我们最能干的一位年轻经理史蒂文·曾负责这两家公司。

史蒂文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经理,大学毕业后即加入林麦,并在台湾服完了兵役。他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任过职,新加坡、曼谷、香港、菲律宾以及孟加拉,而且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初期阶段去的。他从不惧怕到任何一个新的、落后的地区工作,永不退缩,我称他为“林麦的先头侦察兵”。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在此之前担任过林麦最具活力的台湾公司总经理,表现得非常出色。

我决定返回上海。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见到了很多在战乱中劫后余生的老朋友。他们中有些人在政府担任要职,有些则成为学术领域的带头人,虽然都已年过七旬,但很多人仍然活跃在各自岗位。在上海,人们已经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论共产党此前错误的政治路线,谈论很多人因此遭受的苦难。事实上,我们的一些朋友已经在各种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不幸故去,但是谈及此事,每个人的心情都很轻松,因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国家又回到了“现代化”和“发展重建”的轨道上。正如其中一人所说,“一切都已随风而去。”

在上海,我和林麦的员工一起吃过几次饭,史蒂文希望他们能见见公司的老创始人。在宴会上,我见到了林麦早期的另一位天才,他的名字也叫史蒂文,Steven See。当我还在林麦的时候,他就已经加入公司,而且当时非常年

轻,大概只有二十五六岁,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人之一。一天,哈德逊湾公司大老板乔治·科西奇(George Kosich)先生在和我们的经理人员会谈时问,为什么我们把电脑中心放在新加坡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在香港或台北找一间更大的办公室。我对他说,“乔治,你可能不相信,在新加坡,我发现我们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电脑天才,我已经决定让他帮助我们其他所有公司开发电脑系统。”

这个年轻人就是 Steven See,我非常高兴能在上海再次见到他。在我退休后 7 年,他已经被提升为经理,负责林麦公司的所有电脑系统,经常要穿梭于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监督公司电脑技术的更新换代。

当史蒂文·曾告诉我 Steven See 将来参加宴会时,我问他,“他应该还很年轻,结婚了吗?”

史蒂文·曾说,“他准备 10 月 30 日结婚,婚礼将在新加坡举行。”

当我看到年轻的史蒂文时,我告诉他,过去 20 年,我曾三四次努力想学会使用电脑,但都没有成功。而我的借口通常都是,每隔大约两个星期就要外出一次,太忙了。

史蒂文说,“任先生,你到新加坡后,我可以教你。林麦的办公地点刚刚搬到你私人办公室的隔壁大楼。只要你有时间,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两分钟内就会赶到。现在学起来更方便、更容易了,电脑每天都在更新。”

后来我在新加坡待了 10 天,但不得不在 10 月 30 日前离开,所以没能参加史蒂文的婚礼。但是在这 10 天内,他给我上了 5 节课,从打字和打印开始。他是一位好老师,我开始用我学到的东西继续写我的自传。在学的过程中,我没有感到丝毫的压力,上过两次大约 10 节课后,只要看见有电脑的办公室,我都会坐下来,这样,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我的自传就进行到了最后一章。

但在增加工作效率的同时,我开始担心我写的东西会不会伤害朋友们的感情,他们中很多人目前仍生活在美国、加拿大以及一些亚洲国家,我必须实话实说。有几次,当我写到一些可能使人不安的事情时,我决定使用另外一个

名字,或者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代替,这就是生活。但即便如此,当我在叙述中使用真名时,或许我的理解和我的朋友并不一致,而且作为当事人,他们很可能才是正确的,因此,我所写的内容很可能会激起他们的不满。

最后,我们决定,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写,完成后,再尽所能仔细审查。所以,我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容忍我所写的内容,即使有所不满,也仍能把我当成一个朋友。这只是我对一个真实故事的一家之言,人们的观点常常各不相同,而且很可能和我的看法一样真实。

我的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位历史学家,也不是要写教授们的案例研究,我没有日记可以依循,也没有档案可供参考,我的公司的所有文件,包括我个人的,都全部留在了我以前的公司里。没有这些档案,我只能说,我的想法、我的感觉以及我所知道的都是真实的。很多事情都是我亲身参与的,但也有些情况,我只是一个目击者或者旁观者。由于很多事情都牵涉到一些大公司,各项决定和措施都是多种复杂原因的结果,包括政治因素,因此,我不能保证我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我讲述的是“部分真相”,但是,我真诚地希望我的读者能从我的经历中汲取到一些对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益的经验教训。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很幸运能不时打电话给以前的同事和助手,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们中有几位身居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都答应阅读手稿中的部分章节。他们的评价使我获益匪浅,并给予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我的书开始初步成形。

任九皋

2006年12月 新加坡

序

周兆呈

因缘际会结识任九皋先生这样的前辈，我只能用幸运形容。

第一次见到任先生是在 2005 年底。惭愧的是，之前对任先生知之甚少，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说，我的“无知”恰恰反证了任先生一贯的低调作风。

几次时间不短的交谈，亲耳聆听任先生回忆他早年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奇闻逸事，有时，任先生还会如同孩童般开朗地笑起来，那是他想起了年轻时一些人的糗事。我一面讶异于他过人的记忆力，一面惊喜地获知不少前辈人物的另类故事。

宜兴、南京、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这些是任九皋先生生活、学习、工作、创业、起家、奋斗、成功的地方；学生、律师、洋行代理、派克代理、进出口商、房地产商、亿万富豪——这些是任九皋先生 80 多年来的人生历程。

实在是一种缘分，让我有机会对任先生的自传先睹为快。其中写到的 10 多个城市和国家，我都有或长或短的接触体验，自传中提及的人物，我似乎早已似曾相识。在阅读任先生的自传初稿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掩卷设想当年的历史场景，与任先生一起走一趟回忆之旅。

任先生在中国大陆受教育，传统的文化力量在他身上一直延续，对不同时期的生意伙伴一直抱持感恩心态、对努力打拼的员工礼遇有加、对家族成员的温情照顾，在这本自传中贯穿始终，分外鲜明。

书中篇章，每每真实再现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很多在我们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件，在任先生的年代则必须凭藉机智、灵感、勇气，方能踏出至为